

中国书籍文库

江门五邑 风俗叙录

李日星◎编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 中国书籍文库

江门五邑 风俗叙录

李日星◎编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门五邑风俗叙录/李日星编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068-2972-4

I. ①江… II. ①李…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江门市
IV. ①K892.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4180 号

责任编辑/ 安玉霞 张继媛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2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绪 言	1
第一章 江门风俗画廊	7
第一节 江门风水	7
第二节 江门民系	16
第三节 江门风情	24
第四节 江门古圣	35
第五节 江门性格	49
第二章 江门信仰风俗	57
第一节 信仰之源	57
第二节 龙祖龙俗	62
第三节 荷塘纱龙	72
第四节 棠下龙舟	83
第五节 叱石灵羊	96
第六节 醒狮呈瑞	110
第七节 民间祭祀	120
第三章 江门生活风俗	138
第一节 蓬城粤食	139

第二节	茶楼叹茶	159
第三节	五邑骑楼	167
第四节	开平雕楼	174
第五节	祠堂旧话	183
第六节	婚嫁习俗	192
第四章	江门节日民俗	203
第一节	春节蓬城	205
第二节	清明侨乡	213
第三节	端阳粽香	218
第四节	七夕乞巧	221
第五节	中秋团圆	226
第六节	重阳登高	231
第七节	冬至汤圆	234
第五章	江门文武技艺	238
第一节	武术之乡	239
第二节	曲艺之乡	244
第三节	粤剧摇篮	257
参考文献		278

绪 言

民间风俗习惯，简称民俗。它是在人们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中积淀的，以口头传承或约定俗成的行为等非正式和非官方的形式创造和传播的文化现象，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无意地遵循和维护的一种价值追求、伦理规范、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

在西方，“民俗”（folklore）的概念，由“民”（folk）和“俗”（lore）两个词语组成，意思是“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学问”，有的也解释为“人民的智慧”。而研究这种“民众的知识”的科学，也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搜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服务的一门科学，也就是“民俗学”。

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民俗学发端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在拿破仑统治下的德国，在语言、文化和艺术等各个领域，到处都弥漫着浓郁的法国色彩，人们接受法国文化教育，用法语作为自己的日常用语。德国的语言文化，乃至一个独立民族，面临日渐消亡的趋势。许多爱国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号召德国人民反抗法国人从领土和精神文化方面对德国的双重入侵。当时在德国很有影响的浪漫主义流派之一“海德堡派”把中世纪看成是德国的伟大时代，提倡复制“祖国的古董”，向“民间精神”请教，广泛宣传研究古代民间文学，以寻找那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财富的独立的民族。其时，有一对年轻的兄弟雅科尔·格林和威廉·格林深受海德堡派作家布伦坦诺和阿尔尼姆的影响，积极地投入到了这场爱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从1806年开始致力于民间童话和传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寻找德国的文化和传统，先后出版了《儿童和

家庭童话集》(俗称“格林童话”)、《德国传说集》、《德国神话》、《论德国古代民歌》和《德国英雄传说》等民间文学巨著,标志着民俗学学科的诞生。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在写给《雅典娜神庙》杂志的信中,提出用“folklore”一词来概括“民俗学”这一新兴学科,从此,这一学科风靡欧洲。1831年,芬兰成立文学学会,对民间歌谣和故事的搜集整理做了大量工作。1878年,英国民俗学会成立,并创办了第一份民俗学杂志《民俗学刊》。1888年,美国民俗学会成立。此后,民俗学在欧美各地普遍发展起来。民俗学与语言学、人类文化学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的三大“显学”。

中国民俗学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当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国内局势并不稳定,全国正处于风云变幻的动荡中。随着政治变革的大势,知识界掀起了一场以批判儒家学说和倡导白话文为先声的“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众多文化精英成了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他们为了表明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庭抗礼,一反过去贵族化的、古典的、阳春白雪式的研究方向,转而把目光投向当时被认为是“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的属于粗野小民的卑下之作。1918年2月,北大设立了“歌谣征集处”,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先河。1922年,北大创办了《歌谣周刊》,由周作人、常惠、顾颉刚等人担任编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搜集了上万首民谣。在此基础上,民俗的研究又进一步扩大到神话、故事、传说、谜语、节日、风俗、谚语、民间信仰等领域。1927年,中山大学把《民间文艺周刊》改为《民俗周刊》,由钟敬文、容肇祖、刘万章等任主编。《民俗周刊》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讨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此后,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进入了科学研究的轨道。

其实,在我国自古就有一种采集风俗以研究民情的传统。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已有常规采风制度。《白虎通·巡守》引《尚书大传》:“见诸侯,问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据《周礼·秋官司寇·小行人》载:秋官司徒府的官吏中有小行人,其职责之一是考察各邦国的礼俗政事。小行人的采风,是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政治得失。《诗经》所收集的十五“国风”,反映西周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不同地域生活风貌的160篇诗歌,就是研究中国风俗文化的宝贵文献。及至春秋战国,“风俗”成为诸子讨论的热门

话题，孔子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观点；荀子倡导“广教化，美风俗”。同时，记述风土人情的书在先秦也早已出现，《尚书·禹贡》按自然分区，简要记载每区山水、物产、交通；《山海经》以山为纲，按方位记述广大地区的地理风貌、奇闻异志、风土人情，无不都是珍贵的古代风俗资料。两汉以降，游历探险之风日盛，各地民情风俗备受文人关注。司马迁认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他游江淮，上会稽，涉汶泗，过梁楚，采集各地风土人情。《史记·货殖列传》描述关中、三河、齐、楚、越等地不同地域特征的风俗，成为中国风俗文化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典籍。张骞出使西域，原本为执行汉武帝联结大月氏以抗击匈奴的军事谋略，却意外地实现了考察西域风土民情、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使命，大大开阔了西汉帝国君臣的文化视野。东汉班固曾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他的《汉书》不仅记录西域风俗而有《西域传》，而且从地域与风俗的结合上开创了中国正史的《地理志》，为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考论典礼类的《白虎通》、纠正流俗类的《论衡》，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异闻，成为研究古代风俗和鬼神崇拜的重要文献。

我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总数不下于10万种。这些典籍都或多或少地记载了历朝历代的社会风俗，诸如《仪礼》对于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项活动礼仪礼节的记载；《尔雅》对于亲、宫、器、乐、天、地、丘、山、水、草、木、虫、鱼、鸟、兽、畜的解释；《楚辞》对于楚地风情民俗的演绎等等，无不是考察古代社会风俗民情的文化宝典，而更为集中反映民情风俗的莫过于历代层出不穷的稗官野史、杂记实录和小说戏曲等。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小说家”15种1380篇，皆以“丛残小语”的“短书”，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乌菟狂夫之议”，其实就保存了大量早期的民间风习，比如《青史子》记载以鸡祭祀以示吉祥的风俗：“鸡者，东方之畜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礼祭也。”《百家》载录门户之由来：“公输班之水，见蠹，曰：见汝形。蠹适出头，班以足画图之，蠹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班遂施之门户，云，人闭藏如是，固周密矣。”（《艺文类聚》卷七十四）《黄帝说》所记神荼、郁垒执鬼事之来历：“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茱萸，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

以御凶也。”（《风俗通·祀典》引《黄帝书》）相沿而下，唐代刘知幾《史通·杂述》所载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十类著述；明代胡应麟《少宝山房笔丛》所著录的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六类著述，都保存了大量古代社会的民间风俗文化资料，是考察和研究中国民间风俗文化的巨大宝藏。至于如演绎元代社会生活的元杂剧、写实性描绘明代社会生活的《金瓶梅》等，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民俗画。20世纪初，西方民俗学在我国兴起，国内掀起了民俗文化研究的热潮，不少学者开始挖掘、整理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资料，相继出版了系列民俗文化专著。首先是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于1911年9月问世，开创了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史的先河。五四运动以后，学术界从更广泛的视野去研究中国民俗文化，自1922年上海书局出版《全国风俗大观》和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到30年代的十多年间，民俗文化研究成果接踵面世，出版了众多的著述，在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中，爬罗剔抉，披沙拣金，梳理辨析，从食俗、婚俗、礼俗、节俗、宗教、姓氏，以及地域风俗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揭示其源流，阐释其价值，张扬了传统民间风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内涵，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尤其是一些地域风俗文化的专著如周振鹤《苏州风俗》、杨睿聪《潮州的习俗》、杨希光《青海风土记》、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等，为后世地域性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范本。

民间风俗是集体创造、约定俗成、自觉遵从、口头传承、反复演示、周期性循环的群体性行为。它是伴随着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最集中地体现了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情感心理、思维模式、休闲娱乐方式、审美趣味和生存智慧，具有强烈的区域或民族认同感和性格与品位的趋同性。它像一面历史的镜子，承载着人类文明和社会演变的轨迹。典籍中所记载的各地域和历代风俗，固然是价值无比的珍藏，即便是一幅风俗画，都具有不可复制的现代价值，如唐代韩滉的《田家风俗图》、五代李群的《孟说举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南宋左建的《农家迎妇图》、朱光普的《村田乐事图》、李唐的《货郎图》等等，无不是价值连城的至宝。然而，风俗人情是在历史积淀中不断变化的，移风易俗，历代不绝。更何况风俗的传承与流播总是因地制宜，不断变异，《晏子春秋》所谓“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所以，民间才是风俗的繁衍地，百姓生活才是

风俗的“活化石”，蕴藏在民间的风俗文化，也就显得弥足珍贵。在当代，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文化面临世界性的危机，民间风俗正在不断地变为人们记忆中的历史残留物而衰微，甚或消亡。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制订《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创作的建议书》；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0次全体会议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第32届会议上，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一系列国际公约，都考虑到必须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唤起全世界的公民对文化遗产的确认、研究、保存、保护、传承、弘扬和振兴，确保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延续。在我国，各地兴起的“申遗工程”热，正是在这一世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民俗”、“风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概念虽有应用上的差异，而实际所指对象并没有很大区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包括：①口头传承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手工艺。

由此可见，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包含了民间传承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一切民间文化或民俗文化。所以，我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通常使用的“民俗”、“民间风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不矛盾。

江门，地处广东省中南部、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西部，东邻中山、珠海，西接阳江、阳春，北与佛山为邻，南濒南海，毗邻港澳，位居粤西地区和西南各省通往珠三角和粤港澳的交通要道，扼西江及粤西沿海交通之门户。距广州100公里，至香港水路95海里，至澳门水路53海里。江门市辖蓬江、江海、新会三区和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四个县级市。总人口414.27万，面积9541平方千米，约占珠三角的1/4。江门市是全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

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近 400 万，约占全国海外同胞的 1/10。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 107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海外华侨、华人 250 万人，港澳台同胞 153 万人。分布在亚洲地区的华侨、华人约占 20%，美洲地区约占 70%。20 世纪 50 年代，周恩来总理莅临广东省粤西行政区视察时，就曾称台山县为“中国第一侨乡”。

江门地区的粤方言分为广府话和四邑话。四邑话主要流行于台山邑、新会邑、开平邑和恩平邑，亦即新宁县、新会县、开平县和恩平县。由于这四个县邑的方言语系相同，人文风俗也基本一致，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团结一心，素以“四邑”自称而闻名海内外。雍正十年（1732 年）划新会县遵名都、新化都、古劳都等三都和开平县双桥都、古博都址山等地，新建鹤山县。鹤山县实际上也是由新会县、开平县两县析地而置，语言、习俗相近，因此，海外华人华侨常常也以“五邑”相称，而江门市行政区域的确立，就是建立在海外“五邑”籍侨胞认同的基础上，所以，习惯上称之为“江门五邑”。

江门五邑人杰地灵，民风醇厚，文化厚重，既融汇着中原文明、南国风情和华侨文化，又凝聚着西江风俗、五邑习俗和域外风习。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汇，农耕文化与商贸文化的融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荟萃，使江门五邑文化显得格外博大深邃而又风姿绰约，丰富多彩。

第一章

江门风俗画廊

自然生态环境决定地域经济条件，继而决定地域文化和人文风情。所谓“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中华大地，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状况，孕育了不同特质的地域文化，诸如齐鲁文化、湖湘文化、燕赵文化、中州文化、巴蜀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徽文化、赣文化、闽文化、粤文化等等。江门五邑民俗文化，是在江门五邑侨乡这片土地上滋生繁衍的独特的文化类型。它承载着五邑民系的厚重历史，体现着江门侨乡的人文特质，蕴含着江门五邑山水的天灵地气。

第一节 江门风水

蓬江，是一条神奇而美丽的河。发源于云南曲靖乌蒙山脉马雄山的西江，流经两千多公里，汇合云、黔、桂、粤的北盘江、柳江、郁江、桂江和北江等川流，在珠三角水网如织的西岸，竟又分流一水，与奔流入海的主干分道扬镳，由东向西蜿蜒伸展，交汇于潭江。在与西江分流的烟水缥缈间，狗山、烟墩山和凤凰山，犹若蓬莱三山，浓郁苍翠，钟毓神秀。人们易俗为雅，改狗山为“蓬莱山”，把穿流其间的这条美丽的河，则称之为“蓬江”。又因为烟墩山与蓬莱山在蓬江南北两岸对峙如门，故人们因形赋名，称此地为“江门”，蓬江也因此而有“江门河”的别称。

蓬江是江门人的母亲河。它吞吐西江激流，摇曳潭江平川，河宽百米，全长 23 公里，波光粼粼，涟漪悠悠，婉曲多姿，气势如虹，犹如盘踞于两江

之间的蛟龙，把鹤山、新会、开平、恩平和台山连接成一片，而在蓬江分流处的西江中心，正好有一个被称之为“古猿洲”的小岛，形同鲤鱼，林木葱茏，莺飞猿跃，剔透玲珑。古猿洲与蓬江相映成趣，仿佛是飞龙戏珠，鲤跃龙门，风景奇异，形胜壮观。

水乃生灵之源，土为万物之母。西江上游挟裹着大量的泥沙滚滚东流，沉积在沿海星罗棋布的岛屿之间，形成状如五指伸向大海的三角洲，西江与蓬江环绕的这片肥沃的冲积平原，如同牢牢拽住南海的巨掌的腕部，成为三角洲西岸物流集散，商贾交通、人杰地灵的要冲。这里，就是江门的发祥地。

江门地处三角洲西岸冲积平原中心，西有横亘数十里的圭峰山为天然屏障；北有岩古嶙峋的菱髻顶、皂幕山拒挡寒流；南部山势陡峻的笠帽山、凉帽顶分拨海风洋流，太平洋的风暴即使是从台山登陆，也常常会东西转向而不直接侵袭江门；水网如织的东南部，镬盖尖峰峦叠起，大华山、锄头山、松仔山、红桃山、葫芦山林木葱茏，白水带公园风景秀丽，八卦巽位开阔广袤，曙光高照，东南风拂煦。整个江门地域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山环水绕，得天独厚。这里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长年温和湿润，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 22℃ 左右，适宜种植水稻和各种经济作物、绿色植被，四季常春。榕树、棕榈、蒲葵、棕竹、桄榔、木棉、荔枝、龙眼、芒果、香蕉、芭蕉、宝巾花、紫荆花、旅人蕉、金合欢、广玉兰、菩提树等各种花卉果木，翠绿茵茵，林荫婆娑，蕉雨荔风，鸟语花香。宝巾花，俗称簕杜鹃，原产巴西，先传入欧洲，后经美国夏威夷传入我国，1982 年被选定为江门市花。

江门是风水宝地。不知何年何月何人开始卜居于此，开村拓基。当秦王朝设南海郡番禺县、东汉末吴国建平夷县、西晋改平夷县为新夷县、东晋升新夷县为新会郡的时候，似乎还找不到关于蓬江或江门的记载。相传，这里原本是一个百越俚人聚居的土著小渔村。当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已是繁华的墟场，称之为“江门墟”。现在蓬莱山西麓的墟顶街，就是当时墟集的最高处，而三桁瓦 31 级石级，就是昔日圩场埗头的遗址。从水路前来趁圩的乡民，多乘圩船由此登岸。这是古老的蓬江城，亦即江门的发祥地。

“江门墟”的名称，最早见于 14 世纪，《陈献章集》有一首以“江门墟”为题的五言律诗：“十步一茅椽，非村非市廛。行人思店饭，过鸟避墟烟。日漾红云岛，鱼翻黄叶川。谁为问津者，莫上趁墟船。”描写江门墟“十

步一茅椽”的盛况，其热闹繁华，以致“过鸟避墟烟”。当时，江门墟每月逢农历二、五、八赶集，陈白沙不时去墟市买书购物，他的另一首七言诗云：“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他的五言绝句《村步杂书所见》之五云：“趁罢江门市，商船夺港归。溪山愁引望，城郭更须知。”当然，这里所谓“江门市”，是指江门市场，与“江门墟”近意。“江门”地名，在陈白沙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如：《赠左明府考绩之京》“君今考绩赴天官，我只弄我江门钓”；《送梁金会试，因寄林司正》“长歌送客江门道，山鬼听歌浑绝倒”；《崔清献公裔孙潜示遗芳卷，复许示遗像，予既书纪梦之作，于其还也赠之诗》“丹青遗像在，何日照江门”；《赠李司训别》“江门云水地，不绝往来交”；《王乐用僉宪江门看病，别后赋此》“五羊城中老法星，昨日江门看病去”……陈白沙诗中所描写的江门，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明代前期，江门虽然还是可钓可居的云水之乡，但非村非市，行人云集，墟船竞渡，连“五羊城中老法星”也到江门问诊就医。可想而知，当时，江门已经不是一般的村落，而是亦村亦市、亦农亦商、亦渔亦贾、亦文亦武、商贾云集、物流集散的闹市要坊。

江门凭借西江和蓬江的天然水道，北通广州、肇庆、梧州；南达珠海、澳门、香港；东往中山、番禺、东莞、深圳；西至新会、开平、恩平、阳江、水东、电白、雷州、廉江、湛江，成为粤西地区的交通枢纽、广州府的西陲屏障。江门乃水陆交通之门户，其形胜如同关口要塞，真的像升堂入室之大门那样，通塞与否，关乎民生国运之盛衰。

在长期防倭抗倭、实行海禁的明代，作为内陆要塞的江门墟，经历两个世纪的长足发展，逐步形成了西江下游的商品集散地、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商业贸易中心。明万历年间举子李子世描述当时江门新市的景象云：“千艘如蚁集江边，却喜江声歌雨喧。向晚绿杨归渡映，远灯明灭认前村。”明代末年的江门墟，酒楼林立，旅舍相连，商铺交错，各种谷栏、果菜栏、鱼栏、猪栏、牲口栏、杉竹栏等鳞次栉比，“客商聚集，交易以数百万计”。

明清之际，江门遭遇兵燹之灾，尤其是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颁布“移界”令，使江门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灾难。当时，清廷为了切断沿海居民接济郑成功的反清斗争，将濒海居民内徙25公里；康熙三年（1664年）又下令将新会、番禺、顺德、香山、东莞5县的沿海之民内迁15公里。江门在“移界”的范围之内，统治者一边驱赶百姓离开家园向内地迁徙，一边放火焚

烧界外民居建筑。据《新会乡土志》载：“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见者惻然。迁民贫者，行乞于市，露宿衢道，往往饿死。迁民失业，饿殍蔽道，弃儿塞路。”直至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才撤销“移界”禁令，准许百姓迁回原居住地。然而，劫后的江门，已成一片废墟。明末清初江门诗人黄居石的《徙村行》、《悯故乡》和《哀江门》可说是江门移界之难的史诗。《徙村行》云：

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
相传徙村诏作下，居人犹疑未必然。
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
令尹仓皇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馈饷。
犹恐菲薄慢王师，岂无老弱死鞭笞？
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
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咽其泣。
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邱墟；
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
君不见咸阳三月火，顷刻烟尘起青琐；
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
吁嗟谁绘郑侠图，流离载道天难呼；
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乌。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体诗，从清廷的严诏威令写到水南村民携妻负子、流离失所、故土丘墟、旷野对泣的惨状，正是《新会乡土志》所载历史的形象化描写。《悯故乡》云：

忆我之家水南村，一湾流水接江门。
荔子荫连青竹坞，稻花香满绿葵轩。
自窜萑苻无定处，全家漂泊信乾坤；
兵燹未宁复移海，室庐倒塌见荒原。
今春更逢西军至，巷无居人各逃奔。
蓬蒿未除居未葺，道逢里胥忽惊魂。
粟米之征兼力役，民命如芥官令尊。

新丝无收旧谷歉，骨髓已干毛齿存。
即令荒凉无归处，邻里存亡不堪论。
惆怅昔时觞咏地，乱虫寒蚁啼黄昏。

“一湾流水接江门”的水南村，原来是“荔子荫连青竹坞，稻花香满绿葵轩”的美丽家园，入清后，“兵燹未宁复移海”，兵燹官祸，国亡家破，“室庐倒塌见荒原”。《哀江门》云：

江门一望堪痛哭，乱后徘徊江之曲；
日中江上不见人，草自青青波自绿。
忆从丙戌盗纵横，阊阖灰烬无颜色；
甲辰移海尽邱墟，古庙独存新市侧。
雪峰烟起暮钟残，一床苔藓坐弥勒。
先年展界通鱼盐，中泽哀鸿方戢翼。
酒炉旦户尚晨星，大半荒芜廛未得。
今春何复戍清人，筑砦开塹无休息。
毁瓦颓墙塌道平，回顾萧条目空极；
数百年来杂沓场，惟有昏鸦啼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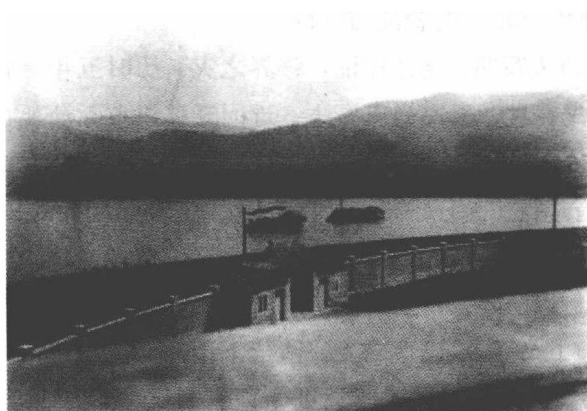
和平宁静的水乡江门，遭遇兵燹、移界、徙村的祸难之后，顿成阡陌灰烬、毁瓦颓墙、荒凉萧条、昏鸦哀鸿的废墟。历经国亡家破，目睹百姓离乱失所、弃婴塞路、饿殍蔽道凄凉惨状的黄居石在“回顾萧条目空极”之后怎能不产生“昏鸦啼山北”的悲泣与叹惋！

江门之史，诗人写照，蓬江作证！移界之灾，历时五年，后经总督李率泰上奏朝廷：“臣先在粤，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以致渐渐死亡，十不存其八九，为今之计，虽不复其家室，第乞边界稍宽，则耕者自耕，渔者自渔，可以缓须臾死。”又有巡抚王来任也曾上展界疏云：“东粤负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广，今概于海滨之地，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之民……请即弛禁，招民复业，腹内之兵，撤驻沿海，以防外患，则国家可以渐补，土地不轻弃，而民生大有裨益也。”康熙八年（1669年）己酉二月，清廷下诏濒海迁民复业，至此，江门民生重获复苏之机。十数年后，江门逐渐恢复昔日光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次年解除海禁，广州成为全国四大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康熙二

十四年（1685年），江门墟也随之设立“正税口”，俗称“江门常关”，管辖西江流域商贸往来。同时，设立盐埠，成为三角洲西岸食盐的集散销售重地。两百多年以后，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江门成为西江对外开放口岸的第一个上下客货停靠站，并建立粤海关江门办公所，江门作为西江南路对外贸易的水路交通枢纽和商品流通中心地位从此确立。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7日，江门海关正式成立，其海关所在地就在现在的江门市蓬江区北街。“江门关”管辖新会、开平、恩平、台山、鹤山、中山、顺德、阳江、阳春等地的对外贸易，成为仅次于广州海关的西江流域贸易中心。1909年正式营运，1920年全线通车的由广东新宁（今台山）旅美华侨陈宜禧主持建造的新宁铁路的建成，从蓬江古城北街到台山，把新会、开平、恩平、台山四邑水陆连成一片，使江门这块背靠四邑、面向港澳的经商宝地，成了“华洋杂处，商旅辐辏”的热土。



1920年江门河渡口的老外（历史图片）



1926年北街西江边的纤夫（历史图片）